

中國民族主義的後現代機緣： 國家遷徙歷程中的集體疏離與個體能動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姚源明

(歐亞教育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摘要

如果當代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全球化，向外整合的過程必然會鬆動中國外交政策所虛擬的疆界，因為外交政策的前提是，國家之間存在不可整合的排他性。本文將透過對中國「小寫外交政策」的詮釋與心理分析，探討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策略如何治療進入全球化後的身份流失，並使失去認同的感傷得以平撫。外界倘若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調適出現認識上的偏差，可能會導致與美國的衝突昇高。其實中國民族主義已今非昔比，不但民族主義已經可以商業化，而且其意義的紛雜正使得個別中國人心中浮現某種主體意志，自然而然地實踐出身份的能動性，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或滿足民族主義需求。這種能動性乃以各種方式存在，在農村的人可能隨時準備接受政府的民族主義召喚，在城市的則可能伺機牟利。

關鍵詞：中國外交政策、民族主義、移民、認同、全球化

* * *

一、前言

Campbell 在重寫美國國家安全歷史時，曾區分二種外交政策：「大寫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與「小寫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①。大寫的外交政策

註① 所謂的小寫外交，是指透過論述上的實踐與建構，使得國家外交政策思維得以發生的觀念與價值前提，取得不受挑戰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國家主權觀，而小寫外交的功能，則是在一般社會生活中不斷地藉由刻板印象，鞏固主權之內與之外截然兩分的認知。比如在美國建國之初，對於印第安人的種種文化論述，即有鞏固美國內、外區隔的作用，故應當視為是外交政策最基礎的一環，詳細的討論與案例研究見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以中共為例，在七十年黨慶時，黨校教材則從鴉片戰爭以降中國「主權」受到傷害談起，見胡繩，*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二，但當時的清廷既無主權觀，也不接受主權觀。黨校教材則在一百七十年後，讓今天中國外交思維所賴以奠基的主權，獲得論述上不可挑戰的地位，厥為小寫外交典範。

指的是現實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觀點中，常以國家之名制定的政策，故在認識論上決定了國家的本質不可挑戰，國際社會是無秩序狀態，並且國家往來時彼此互有威脅。Campbell提出「小寫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想揭露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霸權，指出看似本質的國家，其實是文化領域中所虛擬的一種實踐，因此只是區分內外敵我的想像而已。Campbell稱這種文化虛擬為「小寫的外交政策」，其功能是讓國家領導人取得論述上的便利，不必經過證明就可以理所當然把外交政策的對象，描述成國家賴以存在的潛在敵人，從而掩飾國家的虛擬性。Der Derian 基於同樣的批判理念，乃從「相互異化」的觀點來分析外交中國家互為對象的想像^②。對 Der Derian 來說，儘管或許正是因為外交的目的是增進各國互相瞭解，則外交得以發生的不變前提必須在於，每個國家都是其他國的外在對象，因此外交是國家存在的基礎，而非國家存在是外交的基礎。

上述這些後現代作家對於國際關係當中以「小寫的外交政策」界定外部敵人的分析充滿創意^③，在他們看來，外部敵人的想像是國際關係存在的條件，而國際關係正是「大寫的外交政策」的前提，這類以國家之名制定的外交進一步鞏固了國家建制。然而，現今外交政策的分析並非都是在抵抗敵人或疏離他者的想像中產生的。例如 Alexander Wendt 總結的三種國際關係中，霍布斯式與洛克式的國際關係確實呼應 Campbell 關於製造疆界的批判，然而 Wendt 又提出康德式的國際關係，這種國際關係並不必然會導致相互疏離的認同^④。此外，像目前風行的全球化學說似乎也反對相互異化，或者是以 Der Derian 的詞彙來說，全球化是一種「反外交」^⑤（anti-diplomacy）。假如，在國家本體論上建構國際關係時，相互疏離真的已經成爲一種不可或缺的現象，全球化當然就會是國家與國際關係的危機，因為全球化讓異化某個外國對象的論述方式不再流行。這時，也許維繫國家本體想像的手段，是把自己所一直認同的國家從全球化之中自我疏離出來。

作爲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常在「中國威脅論」或「文明衝突」的論述下成爲一個遭到異化的國家；有時候又因加入了看似一視同仁的全球社會而獲得歡呼^⑥，這裡透露出流行論述之下人們心情的矛盾，似乎關於中國的「小寫外交政策」正處於混亂狀況。問題始終是，中國這個國家真的與其他領導全球化的國家一樣具有相同的歷史目的嗎^⑦？抑或中國只能是一個融合儒家、道家、佛家的一個古怪的國家^⑧？如果中國

註② 見 James Der Derian, *On Diplomacy* (Oxford: Blackwell, 1987), 第二章。

註③ 見 Rob B. J. Walk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第一章。

註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⑤ 他指的是烏托邦下對自我異化的紓解，見 *On Diplomacy*。

註⑥ 更多的討論見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7).

註⑦ Ippei Yamazawa and Ken-Ichi Imai (eds.), *China Enters WTO: Pursuing Symbiosis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1).

註⑧ 見 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90).

外交政策的決策人要享有以中國之名分配資源的正當性，中國政府絕不能讓全球化掩沒、穿透或混淆中國疆界。但是如果當代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全球化，整合過程必然會鬆動中國外交政策所假定的疆界。本文將對中國小寫的外交政策進行詮釋與心理分析，探討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策略如何治療進入全球化後的身份流失，並使失去認同的感傷得以平撫。

二、作為移民的國家

進入全球化想像的中國，很像是一個往別國遷徙的新移民。在全球化的想像之下，以外國為對象的大寫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失去內外區別之依據，從而停止了相互疏離，也就對疆界的意義產生疑惑。中國人現在進入一個文化上迥異的環境，而且是一個過去被認為是夷狄的環境，但如今人們不僅可以容忍，甚至還有不少人準備積極從全球化中獲利。在此，中國人未必在形體上進入一個外國的國度，但心理上不可避免地已進入外國文化。心理上的移民在中國現代史上一點都不陌生。事實上，清末民初的革命領袖們放棄大清帝國接受現代國家體系，可以說就是一種文化移民。在未推翻清朝前，主權國家平等交往的概念曾一度被視為毒蛇猛獸，但後來主權卻演變成反帝國主義的心理基地。中國在概念上成為主權國家後，中國人曾試圖透過文化傳統的共享，來鞏固疆域之內的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今日，全球化的嶄新挑戰不在於形體上的移出，而在於家的歸屬感喪失。

對多數的新移民而言，建立新家園必須先緩和脫離母國時所感受的自我異化。新國度不同的自然環境、語言、飲食、宗教、生活形態與人際網絡等，創造了陌生感，咸對新移民產生難以治療的心理創傷，原本在母國感受到（或說感受不到）的熟悉環境，突然成為移民最殷切需要的東西。當地居民常期待新移民對本地有所貢獻，並定期對在地的社群表達忠誠，這種壓力加深移民自母國異化的創傷。無論如何，作為「家」的母國即使難以回歸，但起碼存在於國際關係的外國中，所以某種與母國想像的聯繫，是新移民平撫創傷所天經地義的。因是之故，大多數中國移民者用祖先祭拜來防止自己對母國認同的消失，譬如記載祖先名字的牌位或父母的照片，都讓人感覺母國的庇佑好像就在身邊。

對於力爭上游的下層移民而言，母國聯繫的想像尤其具有心理治療作用，因為這些低層的新移民會被視為文化威脅，他們卻還要強迫自己對新土地宣布效忠，好保護下一代不受歧視，這種偽裝的效忠對他們就顯得格外殘酷，此何以第一代移民很少能在其有限的生命時光中，完全融入當地社會。然而，他們表現出接受同化的意願，仍是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策略。他們在公開場合壓抑自己的母國認同，理所當然就使得屬於私的家庭成為重現故土與精神補償的政治場合。藉由在家裡延續對故土的想像，使得「返家」起碼成為心智上有意義的潛在選擇。

移民除了須面對創傷外，還有罪惡感，這來自兩個面向：一個是來自對照說屬於敵意環境的國度宣告效忠與屈從，甚至那可能是母國所主要選為對抗對象的異國（如

美國)，故移民對新社區的屈服，影射了對母國潛在的背叛。另一個是捨棄父老，奔走他鄉，自求多福的愧疚，所以蘊含了自我身份的分裂，而移民的人擴大了這個裂縫，他們因而有賴某種治療來平撫或掩飾罪惡感。故常見第一代中國移民努力希望保存其原有認同，並期盼來日能衣錦還鄉，或者他們對家鄉進行經濟投資與回饋，因為這可以證明，他們早期決定移民時所形成的身份分裂，並不是真正的分裂，於是不算有影響到故國與移民者的關係。

如同廣大分佈於世界的中國移民，二十一世紀初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可以類比成在全球社會中正處於移民的狀態，中國人集體進入了不屬於中國的新國度。最新與最值得注意的全球社會樣態就是世貿組織。為了進入世貿，中國的會談代表們必須證明，剛剛決心拋棄計畫經濟的中國政府能遵守各種自由貿易的原則、中國可以開放市場而非只靠廉價生產線傾銷他國、中國政府應可以保障人權而不介入所有的交易過程等。中國所承受各種細密檢核，就像當地社會看待一個來自中國的移民時所透露的疑慮。更精確地說，中國應該對全球社會有所貢獻，而非威脅。為了顯示這一點，歐美國家普遍期待，中國人民得接受適用於世貿組織領導國家間早已適用的文化標準與價值。

不難發現，許多慣於效忠主權中國的人在這些新價值檢證下飽受威脅，在中國領導人用來自我要求的政策中，類似的新標準已經出現。人們熟悉的舊的那一套被視為是封建落後的。譬如，社會主義及其對工人利益的關注與世貿組織的規範無關，也無法挽救負債累累的國營企業；或儒家仁德聖王之治，更會是絕對詭異的邪說。不幸地，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真空的改革時期緊抓不放的，正是社會主義與固有文化。隨著共產黨急於為受創的人民描繪欣欣向榮的遠景，相對剝奪的失落感無可避免要出現，在那個遠景中，已經沒有人們熟悉的自己。加入世貿組織殘酷地揭穿共產黨缺乏意識形態方面的論述能力，甚至恰恰是共產黨員率先在中國人熟悉的論述之外，提出新的目標與價值。中國內部出現不少聲浪反抗全球化，這些聲浪遭到正進入移民狀態的主權國家所批判，無疑表現出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自我異化。

抗拒與批判世貿規範的新左派作家揭穿了黨的知識真空，雖然黨與國家領導人將反對聲浪視為落後的力量^⑨，但令人尷尬的是，知識份子公開對黨領導人以社會主義與工人之名挑戰世貿規範與改革政策^⑩。自天安門事件後，這些新左派與自由派長達十年的論辯^⑪，使黨理論家習慣上會將這些新左派批評家視為與黨站在同一陣線上。當確定中國會進入世貿後，自由主義的分析角度取得上風，黨領導人已不再願意聽新左派作家們的分析。但是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來不支持共產黨，共產黨關過、殺過他們，但沒用過他們，在新左與自由主義都不可用的情況下，黨中央自然地就訴諸一

註⑨ 參見袁偉時，「妨礙中國融入世界實現現代化的兩大頑症」，南方週末（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朱學勤，「從馬嘎爾尼訪華到中國加入WTO」，南方週末（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註⑩ 一篇署名著名經濟學家胡鞍綱的文章公佈在網際網路上，文中批評江澤民允許私營企業入黨。後來胡本人則否認撰寫此篇文章，但在海內外已引起廣泛討論。

註⑪ 其中包括韓德強、左大培、王紹光、楊帆與邵力行。

直等在一旁的民族主義，來安撫自己的徬徨。

同樣令人尷尬的是普遍的盜版情況。在中國文化裡，智慧財產權原本就不是十分說得過去的制度。對熟悉中國實用主義文化的人來說，違反智慧財產權既非全然犯法，更非不道德。中國人反而認為，打著智慧財產之名而超收費用是有違道義的。人們對於中國工人只能從賺得荷包滿滿的外國公司得到比例極其微薄的薪水，感到不公平。然而，加入世貿後，中國政府必須反過來告訴人民，智慧財產權具有法律權利。在中國政府的論述裡，保護智慧財產權這種文化上沒有意義的主張，竟然就是象徵落後。

中共的困境恰恰在於，它所慣用的論述在全球社會中不能用，中國成爲全球社會裡的新移民以後，面對的盡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規範，社會主義反而成爲笑話。就在柯林頓總統成爲中國戰略伙伴後，反帝國主義就失去論述上可以稱許的任何意義。象徵中國共產黨優點的標準都已成過去式。任何人凡在今日提及中國文化的偉大，都得小心以免變成爲封建的象徵。此何以中國在建立新的自我認同時內心受創甚深，蓋新認同乃建立在對舊認同加以洗淨的程度上。中國的未來弔詭地取決中國絕不會再當中國的承諾，更嚴重的是，中國領導人得向全球社會的主人證明，自己決心拋棄落後，並用最冷酷的方式擺脫最愛國的社會主義勞動階級的糾纏不休。

三、融入新世界

目前研究移民的文獻最大的問題，在於過渡強調移入的過程^⑫，只擔心離群、後到者、新移民融入的問題，太少去注意他們移出的過程^⑬。從當地居民的觀點來看，評價移民政策時，大多是根據文化威脅的程度以及對當地發展貢獻的程度。模範移民則是那些帶來技術或資金，但卻沒有異教信仰或奇風異俗的移民。移民文獻忽略的是，移民在調適之前，必先具備進行調適的心理能力，這種心理能力比形體或社會能力更關鍵。移民常必須將自己視爲當地社群的一部份，透過身份認同的機制，發展出言行上的融合效果，然後才會逐漸被視爲是當地一份子。爲了提升適應能力，移民內心裡那種與母國分裂和與自己異化的創傷，必須被認真處理。

來自亞拉非國家的移民，因爲常在文化上遭到歧視，特別容易被當地居民懷疑。當地國家與移民母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高低之分，相當程度會影響移民的自卑感（或優

註⑫ 見 Bonnie Honig, "Ruth, the Model Emigre: Mourning an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in D. Campbell and M. J. Shapiro (eds.), *Moral Spaces: Rethinking Ethics and Worl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 184~210.

註⑬ 許多文獻都對移民表達關心，見 Stephen Castles and Alastair Davidson,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London: Routledge, 2000); Alan Wolfe, "The Return of the Melting Pot," *The New Republic* 31 (December 1990); Nevzat Soguk, *States and Strangers: Refugees and Displacements of Statecraf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Bonnie Honig, *Democracy and the Foreig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越感)。一般來說，盎格魯·撒克遜移民在中國容易帶有優越感，但是移往北美、白亞（如紐西蘭、澳洲，不含以色列）或西歐的中國移民，就容易帶著自卑感^④。兩種情感都不利於調適能力的培養，優越感會提醒一個人避免完全同化進當地社會，除非這個人對自己的母國極度批判。移民一開始時的適應過程，往往策略性多於認同。優越感的移民很像 Edward Said 所謂的東方主義者^⑤，抱著的心情是在當地撿拾令人憐愛的文化象徵。簡言之，有優越感的移民很少有當地人同化的壓力，也不會感受到與母國的分裂，母國與移民者之間不會有太強的創傷與異化的問題。

相反的，有自卑感的移民會面臨到當地社會要求證明其價值的壓力。這首先要與母國剪斷臍帶，造成一個人失根的空虛感，並趨於物質享樂主義。既然這種切斷在當地國不可能得到完全信任，很少有移民能逃過忠誠度的不斷檢視，有些移民假裝完全是當地人，並對自己殘留的母國的身份象徵變得極端敏感。為了完成切斷的要求，他們也許與自己的父母，也許與母國採取對抗，就此來看，在長期而言，有意識地剪斷與母國的連帶關係反而無益於移民的同化。胸懷自卑感的移民在試圖成爲一個當地人時若無法保有原本的母國認同，根本就無法成爲一個完整的人。

移民者適應新社會有賴某種能動性，在切斷與母國聯繫，從而傷害主體意識的移入過程中，這種能動性是難以培養的。但治療創傷的作爲卻經常讓當地社會產生異文化入侵的恐懼，比如中國人最常維持祭拜祖先的儀式，就顯得與當地社會格格不入，即使是中國節日、傳統習俗與家族姓氏，亦不斷提醒在地人，他們是局外人。但是，在移民面對新大陸的不確定狀態時，這些治療機制是相當重要的。以 Winnicott 的過渡物品來比喻的話^⑥，祖先傳下來的碗筷對中國人來說就像小枕頭、小棉被、小毛毯或小熊一樣幫助幼兒脫離母親，建立自己的認同。過渡性的物品幫助移民者相信，他們並沒有離開故國或故國仍在身邊。一旦這種自我異化得到治療，根據當地情況進行文化調整的能動性亦會出現。不幸的是，能協助移民社群的過渡機制常被視爲是拒絕

註④ 自卑感與歷史經驗及文化論述均息息相關，這方面的討論汗牛充棟。在中國大陸，自小學教科書到黨的最高文獻，都以鴉片戰爭爲起點，將近代中國所遭遇的帝國主義經驗深植人心。參見 Yong-tsu Wong,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Kauko La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ondon: Curzon Press, 1990); Edward Friedman,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in Post-Leninist Transformat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2); Kuan-sheng Liao,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860-19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Chih-yu Shih, *Reform, Identity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aipei: Vanguar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99); Z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⑤ 關於移民經驗的更多討論，見 Jan Selmer, *General Adjustment, Interaction Adjustment, Work Adjust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estern Expatriate Managers in China* (Hong Kong: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Busines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6).

註⑥ Honig 也提出同樣的觀點，見 Donald Winnicott,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on," in R. Minsky (ed.), *Psychoanalysis and Gender* (London: Routledge, 1996);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融入當地社會的證據，這使得移民要移出母國來適應當地的生活顯得更為困難。

移民最理想的境界就是以當地的標準擊敗當地人，厥為模範移民。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留學生，他們在研究所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常可以為公司帶來大量利潤，但是他們鮮少去爭取高階管理的職位，有貢獻但無威脅的特質為這些人贏得模範移民的美譽。模範移民畢竟仍是一個移民，以致於調適的過程依舊無法完成。換句話說，當地社會仍維持了一條移民們所無法跨越的無形疆界。移民與當地人各自的認同策略，決定了好處要如何在他們之間加以分配，而移民分配到的往往遠比貢獻程度相若的當地人來得少。

移民者想要同化卻拒絕承認自己正在同化的矛盾，對當地社會來說是一體的兩面。另一方面，要舒緩移民社會與移民母國的異化關係，並且同時要適應當地社會，對移民者來說也是一體的兩面。因此移民研究不應只有處理移入或同化的議題，更要研究移出的問題，故同時也應包括疏離感的治療以及母國認同的象徵性保存。只研究移入往往會看到某種移入的表現，從而忽略移出不順利的創傷會牽制移入。更重要的是，移出的過程是否順利，決定了移入新地方的過程能否順利。此處學術界應該著重的是，移出機制怎樣影響移民在當地進行融入調適的能動性。

全球化已經容許關於移民的價值規範出現鬆動，但報紙頭條只注意離群之間的殺戮，忽視新規範的發展機緣。長期而言，全球化正在加速世界政治迅速地「去疆界」。移民現在更容易在網路上與離散的母國人保持接觸，甚至左右國內政情。故在未來，同化也許愈來愈不會是一個重要議題，蓋得以在互聯網上保留民族身份的移民，會欣然接受同化。整體來說，民族主義運動中的物質部分消散了，隨著各地人們相互接觸機會的無限開展，以領土為核心的團結意識將下降。因為民族意識的維繫更容易、更多元，則移民不必然再因為脫離母國而自我異化，則接受同化的能動性反而更容易培養，容納新移民的地方也就不會感到異文化入侵的認同威脅。

民族主義當然會從全球化與網際網路上得到好處，因為民族主義的信息獲得更有效的傳播。但是，必然有大堆與民族主義無關的問題或符號以及與民族主義矛盾的信息、伴隨著民族主義一起傳播。此外，若人們可從網路上輕易找到民族認同符號，去疆界的現象也就不那麼帶有威脅。換句話說，民族團結可以是虛擬實境，則民族主義就不只是民族領袖的工具，也成為每個人的遊戲，其不可規範性大大提高。大眾與領袖們位置互換了，因為當人們能從容地驅動民族主義活動，他們為什麼要亦步亦趨呼應民族領袖的政治號召？人民在選擇民族情緒的發洩點上取得了能動性，何必還需要追隨領袖淪為被動的棋子？九一一事件中的聖戰士，與甘為人身炸彈的巴勒斯坦男女，許多在生活中都和藹可親，而他們的能動性完全不受國家所操縱。

全球化所如此孕育的能動性使得民族領袖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尤其當人民表現的比政府還要激烈時，像一九九九年美國炸擊中共駐貝爾格勒大使館與二〇〇〇年美國 EP-3 偵察機與中國軍機擦撞事件，中國政府被人民批評說對於事件反應太疲弱。許多媒體喜歡從電子布告欄上引用極端的語言來說明事件的潛在危險性。有趣的是，在此情況下，反政府或攻擊美國大使館的集體行為反而很容易降溫。透過電子布

告欄居然可以看到海外中國學者以及美國的中國專家在一起參與辯論。事實上，當前著名的強國論壇就是在當時的抗議論壇延伸而來的，當政府失去對民族主義詮釋權的壟斷後，民族主義就不再具有和過去一樣性質的威脅性了。

對海外中國人的離群社會來說，上述發展值得關切。到目前為止可以確定的是，網路已經部分消弭了移民與母國人之間的隔閡，我們不能斷說這是母國人變得全球化了，還是移民變得母國化了，因為兩者相輔相成。Der Derian 討論「反外交」中的速度因素時^①，正是著眼於距離消失後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很難再維持相互異化的論述角度。過去率先接觸外國的外交官，他們的言行舉止與外交之間的關係已經動搖，因為他們竟然淪為是最後一批認知到疆界在消弭的人。

四、民族主義是一種療程

中國這個國家在中國人集體移往全球社會以後變成了什麼呢？一般移民社會可以利用全球化重建與母國的聯繫，從而治療異化的創傷，作為移民的國家沒辦法如此自我治療，因為根本沒有母國可以重建聯繫。國家整體的移民猶如十九世紀赴美的移民，是一去不返的。今日，「家」是代表一種決策，而非一個地方。故家是內心的，而非外顯的。就像早期前往新大陸追求新生活的永久移民者，作為移民的國家在登上「世貿」的大船後，也絕無回頭可能，因此家只能存在心中。真的要回家的話，就表示加入全球社會的政策崩潰了。

國家的移動造成的自我異化效應已經接踵而至，中國的生產製造部門要最先面臨致命的競爭。在世貿的體系裡，大多數中國人會因國家對國內的經貿保護不再合法，也似乎不合道德而難以理解。世貿地主國要求進到新國度的中國，應以新規則玩新遊戲，但這些其實都是別人地盤上的老規矩了。換句話說，中國正移民到跨國企業的老巢裡，新來的人面臨眾人指指點點，常會想找一個地方躲起來的靦腆。在缺乏信心、管道與身份的情形下，中國必須證明自己不是麻煩製造者。國家移動是中國現代史從未有的情況，以往中國人鮮少全心全意調適於外來壓力，調整的目的最多是排外，因此西化每每無疾而終。

還記得中國加入聯合國嗎？過去觀察家皆預測，中國加入後的聯合國會很難運作。但是結果是，聯合國卻仍然運轉得很順利^②，沒有用鞋子敲桌子、杯葛議程、紅衛兵佔領的情事發生，倒是出現彬彬有禮的中國代表團努力學習的刻板印象。中國在聯合國中就像是未完全離家的移民，也就像到城市中暫時就讀的留學生，或打工的季節工，或談生意的外來商旅，他們覺得自己隨時要回家。所以，不像當前加入世貿，當年中國代表到聯合國後，可透過缺席或投廢票來抽腿返家，故中國不是移民到聯合國，也不會有失落感，中國只是應邀參與，而且也沒有其他國家把聯合國當成家。相反的，

註① James Der Derian, *Anti-Diplomacy: Spies, Speed, Terror and War* (Oxford: Blackwell, 1992).

註② 見 Samuel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中國人還因為中國被聯合國認可而得意洋洋。中國帶著榮譽與自尊地被承認，對民族主義的需要因此大量降低，隨後代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上海公報證明了這點。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黨領導可以提出唯一合理的問題是：什麼可以調和以往中國與以後中國之間的異化關係？天安門事件後，黨領導努力再三尋求思想上的出路，所謂的第二波思想解放，是靠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再次打開了一九八九年以來停滯的改革；而第三波思想解放，是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重返社會主義初階論^①。兩次思想解放都使得社會主義國家更深入地引進市場機制，使脫離社會主義有了正當化的解釋。但對於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體制崩潰後所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這些仍然難以填補，因為對改革的強調具體地否定了過去中國所曾象徵的價值。江澤民二〇〇〇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也是在試圖與共黨中國的疏離中謀求治療。

之前一項半官方的潮流值得一提，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降有所謂的儒家文化熱，引起對儒家再度的重視，許多電視節目重新介紹經典古籍。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策劃了一連串關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走向的國際研討會^②。在幾乎同一時間，所謂的自由派人士與新左派人士的論爭爆發，特別談論到最基本的問題^③，即身為中國人的意義為何？中國先是在一九九三年亟力爭取舉辦二〇〇〇年的奧運失敗，之後在二〇〇一年以極大的差距擊敗其他競爭的城市，北京城當夜幾乎為之瘋狂，黨中央領導人無不齊聚一堂來沾光。這意味中國人民對某種偉大歸屬的期盼。

與全球化態度不同的，是官方積極參與民族自尊的建立，最明顯的是在準備香港回歸時的表現。從山村小鎮、學校瓦牆與的士門的舊漆上，每處幾乎都可見香港回歸的標語；天安門廣場掛著接近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的倒數計時吊鐘。香港作為全球化的經典城市，其回歸不僅象徵中國的開放，同時也是母國的光榮，這對於從一八四〇年代鴉片戰爭之後開始編寫中國現代史的中國人來說，無疑地具有最有效的治療效果，給人一種延續感，可以用來抵消舉國移民的疏離感。

香港的存在可以有助於聯繫褪色的舊中國與與奔馳的新中國。曾有西方人擔心，香港的回歸會使得中國過度虛榮^④，同樣的憂慮也在一九九三年中國爭取二〇〇〇年奧運主辦權時出現，當時雪梨擊敗中國，這可以視為是制衡中國政府的民族主義情結。同樣的，西方媒體對於香港回歸中國以相當曖昧的態度在處理。一方面記者們忽略中國社會的歡欣鼓舞，多數人反而都提到中國政府對於儀式細節的斤斤計較，並質疑中國是否會因此而濫情於英雄主義^⑤。唯一的例外是英國報紙以相當樂觀的態度來看這

註① 關於思想解放更進一步的描述，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註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中華人文精神的呼喚（北京：九州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嚴瑾等（合編），中西方經濟觀與現代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九九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編），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喚（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註③ 李世濤（編），知識分子立場（長春：現代文藝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註④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華盛頓時報頭版出現一則政治漫畫，意思是說中國在以拳擊手泰森咬對手耳朵的方式痛擊英國。漫畫中的中國有著泰森的牙齒，而英國的耳朵則血淋淋的。

註⑤ 作者閱讀了二十份以上的英文報紙，都沒有不討論中國軍隊進入香港的意涵。

件事^②。這也許因為英國作為移交香港的國家，無疑希望香港未來能持續繁榮，以免給人感覺英國背叛了香港。

共產黨在回歸時得了高分無庸置疑，儀式如此莊嚴而細緻，其裝潢絕對富麗，亙人類歷史也罕見。然而中共似乎完全無意利用高昂的民族自尊來遂行統治，反而是表現出寬鬆的情緒。從事後發展來看，香港回歸其中隱含治療異化的意義大於制衡西方的意義，因為它釋放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年代缺乏自尊的焦慮。如果中共有意利用回歸，就應該藉機向人民索求資源，或彌補因為放棄社會主義所失去的統治正當性。

與回歸相關的一個事件，是中國可以說不的發行^③，這本書在海內外都引起軒然大波。書的大賣使人相信民間民族情緒高漲。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嚴厲地批評美國的中國政策，其中對美國的恨意強烈且直言不諱，但何以這種恨意卻能擁有廣大讀者？故自此之後，描述中國民族主義的英文作品暴增^④，有的擔心其過熱，有的同情其崛起，也有的建議不予理會，最後這種看法若見證了一九九九年美國轟炸中共駐貝爾格勒大使館事件後，學生在美國大使館的示威抗議，就會知道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公安卻又能讓他們排隊輪流有序地接近美國大使館丟石頭呢？美國大使可不能不予理會，他事後回憶時稱當時生死在一線間^⑤。

不管是轟炸大使館還是中國可以說不，都沒有動搖美中關係的基調，雖然不能保證民族情緒不會推翻這個基調，但暫時還讓中美兩國政府很快地處理這些事件。儘管如此，民族情緒是存在的，但持續多久則需視情況而定，且強烈的情緒必須有所紓解。然而，改革中的中國既不能依賴民族主義而生存，也不能視若無睹。由於中國被整合進全球市場就如同移民到美國主導的國度，對抗美國的中國民族情緒便成為自我異化的中國人重振自尊最方便的出氣口。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是必需有，但卻不能一直有的兼差事業。

五、開放民族主義的意義

雖然偶爾時興的民族主義是健康的，但是在新環境當中的民族主義已經不只是民族主義而已。就拿國內少數族群的例子來說，為了促進發展與開放，少數族群求發展最快的方法，就是利用主流社會對於奇風異俗的想像來促進觀光旅遊。這並非表示少數民族文化是捏造的，但是為了滿足一般刻板印象，旅遊業通常將少數民族文化與自然、身體、性別解放以及落後聯想在一起。觀光客甚至必須不情願地配合少數民族的表演者，常使得此一刻板印象營造得非常成功，但若觀光客堅持不配合，當地的民族

註^② 見“Hong Kong—‘Safeguard’: Chinese Promise Early Elections,” *The Times* (June 30, 1997), p. 1.

註^③ 宋強、喬邊、張藏藏（合著），*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註^④ 例子可見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Z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⑤ James Sasser, “Rocks, Paint and MREs: Under Siege The U.S. Ambassador’s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Attack on the Beijing Embassy,” *Newsweek* (1999, 5, 24).

表演者甚至會覺得不受到尊重^②。易言之，觀光客的配合是對民族刻板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有兩個意涵：一個是觀光消費，另一為創造身份。觀光客主要來自漢族地區，當地的少數民族經由刻板印象的營造來與漢族區別。到了改革時期更要繼續靠觀光收入來鞏固與漢族的差異，並藉由收入來支持子女赴城市就學。這種收入導向的作風有時會引起老一輩的不安，以為民族身份可能因此而模糊，年輕的民族農民往返於沿岸城市打工賺錢，摧毀了老一輩熟悉的安定，不過打工的人不少仍然保留民族節慶的風俗，這類活動很少會讓城市居民有文化入侵的威脅。

在實際狀況裡，不論是家鄉的觀光業或城市的民族節慶，都不能決定民族身份的意義^③。因為觀光業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少數民族的落後印象，並因而在長期裡其實損害了民族自尊心。這種現象不是黨中央或民族幹部開發觀光業時所預知的，即使在民族關係融洽的地方，某種反漢族的情緒相當普遍地存在，通常這種反漢族的情緒既非政治性的，也無政治後果，恐怕反漢族情緒主要來自少數族群無法獲得清楚的身份，故並不是因為政府政策或與漢族的關係所造成的。

少數民族身份政治發展的方向甚為紛雜，顯然不符政府的期待，在這些認同政治的進行中，因為都缺乏「反抗」的形式，所以沒有引起政府或國外學者的注意。就四川涼山彝族的例子來說，當地方政府慣常責怪彝族的奴隸與封建積習，村民的回應是消極的疏離，表現在就學率的偏低^④。當然，當地人並非有意識地以疏離來抗拒政府，但是政府的教育政策的確使得彝族缺乏就學誘因，當政府一心想要把當地人從落後中拯救出來時，沒有察覺彝族以不就學來消極抵抗。這種抵抗政府聽不見，看不見，也感覺不到。於是，彝族落後的形象諷刺地保護彝族人避免成為另一批無身份的國家公民，也免於漢人的積極干涉。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寧夏立通的回族發展。當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進入市場經濟，很少有人可以每天面向麥加方向禱告五次，或者是進行宗教教義所要求的齋戒，而且他們之中極少人到清真寺聽講經，這似乎意味宗教認同的消退。但是一項長期的研究卻顯示相反的結果。地方領導者說明，許多超過四十歲的人開始回到清真寺；超過五十歲的人開始準備存錢去麥加朝聖，甚至許多超過六十歲的人都在準備朝聖。一旦去朝聖過，他們成為最真摯的信徒。政府當然不會覺得老信徒有什麼威脅，但假如是年輕人大量成為信徒的話，國家豈能安然坐視？這幾乎就像當地人與政府之間有個默契一樣，四十歲前屬於國家，四十歲與五十歲之間是過渡期，六十歲則會歸返教民身份^⑤。

註^② 作者所討論過的反身東方主義(reflexive Orientalism)，見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2), Ch. 4.

註^③ Tim Oakes, *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998).

註^④ See Chih-yu Shih, "How Ethnic Is Ethnic Education: The Issue of School Enrollment in Meigu's Yi Community," *Prospect Quarterly*, vol. 2, no. 3 (July, 2001).

註^⑤ See Chih-yu Shih, "Between the Mosque and the State,"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 28, no. 2 (June, 2000).

有時，中國少數民族的情況頗像前述主權中國邁向全球化那樣，相當刻意地貶損那些仍棧戀社會主義或地方傳統的人。當一般相信觀光業有助於少數民族脫貧致富時，觀光活動其實把對少數民族的評價，放到賺錢能力方面來觀察。這種角度只能進一步讓民族身份空洞化，因為少數民族的身份不再是情感上的呼應，而是促進物質條件發展的工具。譬如從國際組織爭取基金，或向政府爭取賦稅減免、建煙廠賺錢的營業特許或受教育的名額保障等等。一旦少數民族身份與實用主義結合，這個身份的意義必然變遷，不但民族身份可用來抵抗改革，它也可以利用改革來提高經濟效益，這個兩面性使得少數民族身份一方面能化解改革帶來的自我異化，另一方面又免於與改革採取截然對立。

在全球化下替黨領導者護航的中國民族主義也發展出兩個不同的方向：當黨領導人需要民族主義舒緩國家移民所引起的自我異化焦慮時，黨領導人在海內外都逐漸失去對民族主義的控制力。有幾個原因是導致黨在國內對民族主義失去控制力：首先，任何企圖以國家之名控制意識形態者，都可能引起全球社會關於極權統治的疑慮，而控制不住民族情緒也可能引起關於中國威脅的疑慮。徘徊之間，國家領導者無法制訂清晰的民族主義政策，更遑論壟斷民族主義的解釋權。其次，當人們仰賴民族主義而賺進大筆銀子後，民族主義似乎就沾染了改革致富的氣息，這時國家有何要介入的動機？再加上民族主義意義的日漸紛雜，可以減少政治民族主義的極端性，則用民族主義來紓解異化並支持進一步全球化就不會弄假成真。最後，在新世代民族主義的符號更是變化多端，黨領導人很難替不再仰賴黨提供資訊的群眾詮釋所有這些民族主義符號的意涵。

實際上，黨本身也要為民族主義內涵的分歧負責任，因為正是黨自己始作俑者引起人民對於民族主義的敏感。就如之前所提過的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反映了不在少數的中國人懷有反美情緒。此書銷量奇佳卻反映出官方立場的尷尬，它一方面說出許多政府高層官員的情緒，但也同時暴露政府面對國際壓力的脆弱。短期之內，中國還是可以說不、中國不當「不先生」等「說不」的書陸續上架販賣^{註②}，擺明的是民族主義的商業取向，而非民族取向。當然，商業取向的前提是，民族主義情緒畢竟普遍存在，姑且可名之為商業化的民族主義。

六、發展商業化的民族主義

形式多變的民族主義幾乎可出現在任何公衆宣傳上。中國可以說不只是結合民族主義與商業利益的產物之一。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主義一度透過電台凝聚分散各地的民族成員，但商人看中了電台的商業潛力之後，其節目內容出現了明顯

註② 宋強、喬邊、張藏藏（合著），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他們兩年後出版中國還是可以說不；另外沈驥如亦出版中國不當「不先生」（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變化^③。至於中國民族主義者向大陸各角落訴求，訴求得愈成功，市場潛在利潤愈高。故民族主義教育的政策優先序愈高，市場潛能愈大。若民政部決定印刷反精神污染的教材，並要求每村買一本，豈不是暴利的保證？同理，全國各省市自己一定都想爭食精神文明市場，每次反精神污染或國情教育，各地、各部門、各單位都出現寡頭壟斷市場。

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不論是精神文明、反和平演變或中國國家狀況調查的教材，都在天安門事件後成為政府制衡國際制裁的文化宣傳品。除了極少數點名叫罵的之外，這些教材大多枯燥無味，但只要符合官方宣傳的需要，發行管道暢通，就會洛陽紙貴。許多設了出版機構的單位領導者也因有利可圖，而常指定下級機關購買指定教材，有時甚至多到造成民怨。如此一來，賺錢成為愛國主義的重要部份。

但賣教科書的利潤大體上並不會改變民族主義的教育內容，可是有可能會影響作者的寫作風格，因為總是有人要撿拾剩餘的市場，作一些花巧的包裝，**中國可以說不**也許是個範例。但教科書畢竟難以吸引讀者，必須端視政府在特定時間內對於受屈辱的事件到底有多認真。在一九九二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結束後，反精神污染立刻銷聲匿跡，說明民族主義的潛在利潤可以有很大變動，但沿海各地迅速脫離社會主義，造成社會向美國帝國主義傾斜的異化發展，也為後來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的暢銷，奠定心理基礎，讓因為幾年來徘徊在全球社會門口不得其門而入所累積的挫折感，提供了一個宣洩的管道。

其他型態的民族主義同樣可替個人或政府產生收益。在個人的例子中，從以前的李小龍到當代的成龍與李連杰，都製造了一個投射挫折的中國英雄在電影中打敗外國的對手，藉以治療身份的流失，並大牟其利。懷舊的鄉愁一直都是電影最好的主題，它藉由連結過去與當代，來調和未來與過去之間的相互異化關係，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一定隱藏在鄉愁電影或連續劇之背景中。例如影射改革的連續劇「雍正王朝」，使昨日的中國與未來的中國融於一個看似共享的、連續的歷史中，充分調和了政策所造成異化，成為最賺錢的節目。關心中國人的福祉是螢幕上的英雄與觀眾的共同關切，把歷史與今日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厥為不朽的民族。

電影院之外，擊敗外國人的英雄也可以出現在奧運競技場上。由於在奧運中的中國運動員是與白種人同場競爭，因此比亞運更有治療效果。中國人珍視他們的英雄不僅因其運動表現而已，同時還有他們帶給國家的榮譽。因此金牌得主不但得到獎金鼓勵，同時也可藉名聲大撈一筆。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推銷運動英雄的手段在中國都照搬不誤，差別在於中國運動迷的民族情緒頗高，如果勝利被個人化，恐怕崇拜就會退潮了。要證明國人對選手的崇拜部分出於民族主義並不容易，起碼英雄崇拜並非中國文化很常見的事，除非這個英雄代表某種大我的光榮。小山智麗的例子值得一提^④。

註^③ 見 Richard Maxwell, "Technologies of National Desire," in M. Shapiro and H. R.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327~351.

註^④ 見 Anthony Kuhn, "Ping-Pong Politic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2.8.1994), pp. 44~45.

華裔日籍的小山智麗（何智麗）被中國人視為叛徒。她在新德里世界盃不聽從教練指示，擊敗隊友，再擊敗教練認為她可能不一定能贏的對手奪冠。結果她自此遭冷凍。之後她嫁給日本人，帶著一九七二年中國乒乓外交時的教練同行，這位教練在文革中境遇頗差，現在與何智麗聯手在亞運會裡擊敗中國隊。他們的故事充滿復仇味。果不期然，小山智麗在大陸民間媒體上引起熱烈辯論，主要是她被質疑背叛了祖國。支持她的人不是沒有，有趣的是，支持她的理由很大我：要麼是認為，畢竟贏得金牌的還是中國人；要麼就是讚揚她的反抗精神有助於中國體育界的改革^⑤。

何智麗的例子從反面說明中國球迷花錢在運動明星身上關乎大我崇拜，所以是民族身份的一種確認。理論上獎牌愈多治療效果愈佳，一般人購買運動明星掛牌的體育用品，可以算是對消費民族主義的付費。過去擔心讓中國辦奧運會變成向希特勒辦奧運那樣的喧囂民族主義，這種擔心完全誤判了民族主義對於作為移民的中國的意義。民族主義的意涵隨著呈獻民族主義的方式而多元化。官方雖然繼續由上而下在主導民族主義的內容與方式，但是愈來愈不能壟斷民族主義的意義。即使當政府尚未準備好，有時候公民已經透過他們的管道表達對民族主義的能動需求。美機轟炸中共大使館事件顯示出，中國學生對該事件的快速反應出乎意料！快到身歷其境的美國學者堅信一定有官方動員，也快到中南海曠日持久的會議結論時間遠遠瞠乎其後。各種詮釋與實踐民族主義的能動性，不得不與改革開放有關，因為改革開放動搖了傳統的中國認同，逼著大家尋求治療；與新興的市場有關，因為市場讓民族主義有了價格；也與奧運有關，因為欣賞奧運的人民在欣賞與消費民族主義的行為中，體會出了主體能動性。

另一方面，當這種能動性因應社會情緒、政府宣傳與偶發事件而提出民族主義要求時，政府並不一定能輕易控制民族主義的內容、方向與強度。中共駐貝爾格勒大使館挨轟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原本期待此次事件能成為另一個振興民族的「新五四運動」，把知識界從下海向錢看的潮流中驚醒，但熱度卻在後來迅速消退。即使二〇〇一年的EP-3撞機事件熱潮會讓自由主義者擔心不已，但也只持續幾個禮拜。在美國人的眼中，民族主義的風潮都是政府動員的結果^⑥。實際上中國政府可能希望這些民族主義風潮能再持續一陣子，來滿足群眾需要，但又不至於太瘋狂以免減少政府處理中美關係的籌碼，不過人民的動向根本不在預測範圍中起伏。

民族主義已經有太多宣洩的管道了，中國人可以在電動玩具的虛擬中打敗美國大兵，他們可以看中國第一個NBA球星王郅治在達拉斯受球迷歡迎。諷刺的是，王郅治在NBA第一場球正值EP-3事件發生，中國人想要為大郅歡呼，卻又覺得應該為喪生的中國飛行員自我克制，不要在中美政治對峙時出現歡呼舉止。這種自我克制與欣

註⑤ 參見 Chih-yu Shih, "Defining Japan: The Nationalist Assumpt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L*, 3 (Summer 1995).

註⑥ 關於類似狀況下也可能會有後現代認同的崛起，見 David Michael Green, "The End of Identity? The Implications of Postmodernity for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Nationalism & Ethnic Politics*, vol. 6, no. 3 (Autumn 2000), pp. 68~90.

賞大郅在美國媒體得到的注意，都是民族主義的表現，但又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組合，不禁令人想起Milan Kundera的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也恐怕會在長期裡培養出民間面對民族主義動員時一種尖酸的能動性^②。這並非意味民族主義不適用，相反的，民族主義的興起，形式、長度、影響與意義都不再是黨領導人可以獨斷的。這無關乎群眾的反抗，他們沒有反抗意識，但卻實踐了不起眼的能動性，不斷地重新詮釋民族主義。

七、流動的外交政策

研究政治科學的著作常將民族主義視為遲早要淘汰的意識形態，終將為理性社會所拋棄^③。即使中國企圖進入全球社會，成為歐美行列中的正式一員，但由於中國社會週期地訴諸民族情緒來處理國際事務，就被懷疑是為過去歷史的落後因素所累。中國進入全球社會之途遭逢各種國內外的阻力。就像美洲早期白種移民遇見十九世紀的中國移民時那樣，今天幾個主要的國際行為者也從頭到腳檢視中國可能帶來的貢獻或文化威脅。他們用自己熟悉的價值觀來評估，到底中國距離自己還有多大一段距離，這幾乎保證中國不會被接受成為全球治理中正常的另一員。

原因在於中國作為一個移民，就如同任何過去的個別移民一樣，需要方法來調和新移民認同與過去認同之間的異化關係。個人最方便的作法就是隨身攜帶與祖先有關的牌位、傳家寶、飲食習慣或生活風格，作為移民的國家則帶進鄉愁、文化復興、抵抗或犧牲等意涵的民族身份。但這些調和機制很容易引起當地社群的被威脅感，故雖然有助於移民最終融入，卻反而成為文化異端或拒絕融入的證據。正因為對後來的移民不信任，作為移民的國家可能陷入長期循環的民族對抗情緒當中。結果，檢查中國的標準日趨簡化，就是看中國要變得與自己還差多遠。

檢測中國能否融入全球社會的流行標準中，民主化與人權保護的程度最耳熟能詳。美國國務院每年公佈人權報告，記錄中國還有多少政治犯，有多少反對黨活動的空間，刑事犯有多少不人道的遭遇等等。相形之下，中國民族主義就變成是要求一個愛國者，不可以使用同樣這些指標來評估政府，而應以經濟發展、免於帝國主義侵略、學習本國文化、平等的主權國家等指標來取代美國的人權標準。如果兩方的爭鋒能替中國保

註^② 見 Aaron Asher (tran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6).

註^③ 該論點來自福山的暢銷書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ron, 1992); 同時可見 Alan Charles Kros, "The West at the Dawn of the 21 Century: Triumph without Self-belief," *Watch on the West*, vol. 2, no. 1 (February 2001); 相關的批評可見 David Campbell,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98); 或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Revisiting the 'National': Toward an Identity Agenda in Neorealism?" in Y. Lapid and F.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p. 105~126.

留足夠的面子，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的改革才會持續執行。其實美國何嘗不是如此？美國政府針對中國政府違反人權的狀況必須時可表達關切，表態充足之後，美國政府將中國拉入全球社會的政策才會得到國會支持。

比民主化與人權稍微細膩的標準，是看中國的市民社會成熟了沒有。採這種角度的話，可能對中國較有耐心，因為市民社會的形成理當是長期努力才可能。在政策上，市民社會理論家或許傾向與中國全面交往的政策，中國學界則有人鼓吹保留某種集體主義價值的中國式市民社會^③。至於新馬克思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則對全球社會的剝削性質保持警覺。不過，總的來說，中國人對於全球社會的檢查，抱的是一種既順服又對抗的態度。

中國領導人鮮少趁著美國與他人衝突的事件，來提昇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似乎是用來與美國衝突時用的觀念，某種程度的中美衝突以及反抗美國的過程，帶給中國領導人更多超過國家利益的心理滿足，幫他們證明加入全球社會不是自我異化。如果中國領導人決心要融入全球社會，則一般所謂的的國家利益往往不會是他們主要關切，這也就是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與二〇〇一年反恐聯盟中，中國政府不是釋放政治犯就是毫無考量地合作。只要全球社會的守門員處於劣勢，象徵民族主義的國家利益對抗就會跟著降低。

另一方面，假如感到有人想測試民族主義的真假，中國政府的反應經常強得出乎意料。可以舉一個政治方面的例子與一個經濟方面的例子。在政治方面，像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中國政府即認為，美國容許台灣總統李登輝往訪，是代表對一個中國立場的否定，因此決定做出極強硬的反應；經濟方面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全力維繫港幣價值，不顧一切，其中屢以與外國勢力的戰鬥來自況；因香港甫回歸中國，若落入國際投機客之口，豈不連帶推翻了改革的正當性，故是民族主義敦促著戰鬥心態，而戰鬥心態給改革提供了正當性。

有趣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方向也很紛雜。當中國政府極力拉攏台商前往大陸投資，雖然各地有層出不窮的騷擾，但中央的優惠立場絕對的明確，這種優惠的目的當然是想促進政治統一。相對於此，台北當局的反中國口號以及堅拒絕西進政策的立場，使得大陸台商的地位相當特殊。雖然台商可能覺得台北當局在政治上不斷騷擾他們，但在一定程度上，台北政府等於是在治療台商西進時經歷的自我異化，因為台北採取反華的強硬政策，使台商的台灣認同不會模糊掉，則西進時就不至於產生自我疏離。台灣政府拒絕與中國政府進行統一協商猶如在調和台商與台灣人的異化關係。

令人擔憂的是，外界倘若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調適出現認識上的偏差，可能會導致

註③ 例子可見鄧正來，*研究與反思*（瀋陽：遼寧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特別是第二、三章；同時可見 Brantly Womack, "Transfigured Community: New-Traditionalism and Work Unit Socialism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126 (June 1991), pp. 313~332.

與美國的衝突昇高。其實中國民族主義已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民族主義的商業化以及其意義的紛雜使得每個中國人取得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民族主義的能動性。能動性以各種方式存在，在農村的可能隨時接受政府的民族主義召喚，在城市的則可能伺機牟利。民族主義有了影子價格，即使黨、政府、時事、新左派、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的民族主義訴求都澎湃洶湧，但用什麼方式來滿足民族主義的心理需求，漸漸成爲個人可以回答的事。隨著中國移入全球社會，民族主義會更重要，但個人的能動性也愈影響民族主義的意義。這些個體能動性合起來的話，很可以在沒有事先規劃的情況下，開展出日前難以預知的民族主義詮釋與行動。

* * *



Part-time Nationalism for Sale: A Self-estranging State about to Immigrate

Chih-yu Shih & Yuanming Yao

Abstract

I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s to continue enjoying legitimacy, one must not allow globalization to overwhelm, penetrate, or obscure the boundary of the Chinese state. However, if the contemporary goal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s to globaliz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unavoidably questio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y reinterpreting and psychologiz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tackles the discursive strategy, pertaining to nationalism, to make China's entry into globalization emotionally more manageable and less felt as a loss of identity. While there is worry that Chinese nationalism, if mismanaged, may lead to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ism today is no longer the same nationalism as before. Most importantl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the bifurcation of its meanings have granted some agency to individual Chinese to interpret and practice nationalism as each sees proper. This citizen agency exists in various forms with those in the countryside ready to answer the call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ose in the cities acting more spontaneously. These individuals can together, without necessarily planning collectively, bring out interpreta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be anticipated beforehand.

Keywor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immigration; identity globalization

